



上医校友会简报

【2015】第2期（总第30期）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5.03

母校新闻

复旦大学领衔“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参与“中国脑计划”



在刚刚结束的东方科技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脑科学研究院教授杨雄里表示，类脑计算和人工智能研究是即将启动的“中国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以阐明脑的工作原理为目标的脑科学，是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科学前沿领域之一。已被列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之一，“中国脑计划”正在酝酿中，不久将启动。

上海市政府已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列为重大科技项目，成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举措。自2012年，复旦大学牵头联合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及中科院研究所，成立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医学、数学、神经学等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已在大脑研究中取得多项进展。推进脑科学研究和转化应用，积极推进和参与“中国脑计划”的实施。院长马兰教授表示，上海在脑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将在未来为互联网、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最佳的结合点。

据悉，近日徐汇区副区长王宏舟带领枫林街道、区科委和高委有关负责同志来到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现场办公，共同支持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马兰教授、杨雄里院士向王宏舟副区长介绍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培育和“中国脑计划”、“上海脑计划”推进情况及与徐汇区政府推进共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议和初步设想。桂永浩副校长表示学校积极支持中心与徐汇区共建。王宏舟副区长表示区政府将从多方面支持脑科学协同中心建设，要求在政策、空间、人才引进、资源汇集各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和保障，与复旦大学携手共建，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出贡献。（文汇报 2015.03-18，上医新闻网）

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设立



3月19日-上海，首届复旦大健康论坛暨“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成立签约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为感恩母校培养，在新常态下助力国家医疗卫生发展和改革，促进医学研究高效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复星集团通过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在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建设“一号医学科研楼”（命名为复星医学科研楼），支持复旦医科发展战略以及奖励在医学科研、创新管理、成果转化和教育发展等领域的杰出团队和个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上海市卫计委党委书记黄红，复星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校董郭广昌，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梁信军等出席当天活动。（复旦大学新闻网）

儿科医联体完成布局 十家成员覆盖上海九各区

日前，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正式加盟成为复旦儿科医联体成员。至此，在短短的9个月中，复旦儿科医联体作为国内首个儿童专科医院基本完成了布局，10家成员医院覆盖全市9个区。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表示，儿科医疗服务专业化、分级诊疗、集团化运行是国内外儿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已有成熟经验，但在我国儿童三级医院医联体模式尚无先例。而通过儿科医院人才输出、管理与服务模式输出，则将真正实现让儿童在家门口的二三级医院就可以体验儿科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水平。复旦儿科医联体正式成立于2014年4月16日，由上海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共同发起成立，联合提供儿科和新生儿科服务的其他9家我校附属医院组建而成。



据统计，去年该医联体儿科门急诊服务量达 306.8 万，占了全市儿科服务量的 1/3，为进一步缓解儿童就医难矛盾，改善就医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儿科医院)

校友动态

卢洪洲理事荣获“2015“最美援外医生”称号

2015 年 3 月 24 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上医校友会理事、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与海军卫生部综合计划处王志慧等 10 名援外医护人员当选为 2015“最美援外医生”称号。



2014年卢洪洲作为中国首批援塞拉利昂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的一名医学专家，并担任培训队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在援外工作期间，卢洪洲与队友们不畏环境艰苦，不顾个人安危，奔波在塞拉利昂各个疫区最前线，卢洪洲利用自身非常丰富的传染病救治临床经验，积极展示我国产染病防控的经验、特色和优势。他因地制宜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多种形式的操作演练，针对基层医务工作者、公共卫生人员、基层管理组织者和社区志愿者开展教学培训，传授埃博拉防抗的关键知识点，将我国急性传染病防控经验运用到当地埃博拉防控实战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受到了当地和国际组织包括塞拉利昂总统在内的有关各方高度评价。

卢洪洲理事简介

卢洪洲，教授，医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安徽省蚌埠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96年获上海医科大学传染病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内科学博士学位，2002年美国田纳西州Vanderbilt大学分子流行病学博士后。现任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艾滋病学会会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上医校友会理事等。

校友张金哲院士荣获“2014最美医生”称号



3月26日，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揭晓了“最美医生”名单。经过三个多月的寻找和推选，最终评选出张金哲、贾永青等十名个人，获得活动组委会授予的“最美医生”称号。

校友张金哲院士今年已95岁高龄，他也是中国小儿外科手术的重要创始人，被称为“小儿外科之父”，他的一生就是中国小儿外科的发展历程。他发明了目前医疗界广泛应用的“张氏钳”、“张氏瓣”等手术器械。他用稿费成立基金，资助贫困孩子看病。行医64年，他始终坚守两个习惯：兜里永远装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典型疾病症状、治疗要点、注意事项，坐诊时发给家长。

从2014年开始，“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更名为“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在总结和借鉴前两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拓宽了寻找范围，把关注的目光延伸到了整个医生群体，在包括乡村医生在内的整个医生群体中寻找“最美”人物，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感受责任，体味崇高。

张金哲校友简介

张金哲，1920年9月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表学术论文达250篇以上，主编和参加编写各类大型医学著作20余本，为亚洲小儿外科学会执行理事，美国《儿外科杂志》及国际《小儿外科杂志》顾问，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沉痛悼念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原会长、名誉会长，上海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世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3月16日21时21分在中山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0岁。



朱世能同志1936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41年至1948年，先后就读于苏州平直小学、江西上镜信江小学、苏州南园镇第一、第二中心小学，1948年至1954年就读于苏州中学。1954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攻读本科，1959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直至2006年退休。期间，1963年6月至1966年6月攻读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谷镜沂教授。1975年6月至1977年6月，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上海市赴西藏医疗队到拉萨和藏北工作。1980年2月至1981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肿瘤生物学系做访问学者，得到哈佛大学很高的评价。1984年7月至1994年2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至2008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会长。

朱世能同志长期从事肿瘤学研究及病理诊断工作，并致力于肝癌发病机制的研究，是国内研究“乙肝病毒与肝癌发病关系”的著名专家，是“211工程”肿瘤学科学术带头人。他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成果突出，在“肝癌肿瘤标志物研究”等领域成绩卓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8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朱世能教授主编了《肿瘤基础理论》、《现代肝脏病理学》等六部学术专著，参编《现代肿瘤学》、《实验肿瘤学基础》、《临床肝胆病学》等专著十余部。其中由朱世能教授主编的《肿瘤基础理论》一书成为影响国内病理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以丰富的病理解剖案例为题材编著的《医林奇案》一书，也已成为我国广大病理学工作者案头必备指导用书，深受同行赞誉，该书荣获全国科技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奖项。朱世能教授曾担任两届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上海市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对中国病理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朱世能同志潜心医学教育50余年，身先垂范、甘为人梯，关爱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始终做到政治上引导、工作上支持、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帮助，即使是在担任校领导期间，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仍然做到有问必答，循循善诱。他的那些活泼生动的案例、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回忆。为了帮助系里青年教师及研究生提高英文水平，已是70多岁高龄的朱世能同志仍然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青年教师及研究生英文沙龙，亲自指导英文阅读、演讲技能，凡受过朱世能同志指导的师生们无不有如沐春风，醍醐灌顶之感。朱世能同志曾获得“上海第一医学院先进工作者”、“普康—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奖”、上海医科大学“我心中的好老师”、“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者”、“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朱世能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为人公道、作风正派。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期间，先后分管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工作中始终保持勤勉务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殚精竭虑、一心为公，为学校改革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在担任上医校友会会长期间，他尽职尽责、协调各方、不辞辛苦，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上医校友会帮助组建和发展了19个地方校友会，广泛动员校友为校庆献计献策，为母校发展捐款出力。即使在退休后，朱世能同志依然牵挂着学校的事业发展，在关心下一代等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组织编写《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一书时，朱世能同志虽已年逾古稀，却不辞辛劳帮助编撰组奔走联系采访相关人士，他的“上医情结”深深影响和教育着在场的每一位年轻人。

朱世能同志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立场坚定，百折不挠。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他始终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学力坚深、勤耕不辍，生活俭朴、淡泊名利，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楷模。朱世能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一位谦和儒雅的良师益友。他的高尚品德、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3月21日上午，朱世能同志的告别仪式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复旦大学捐献接受站告别厅举行。数百名师生员工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朱世能同志。朱世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党政领导、校党政领导和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以各种方式对朱世能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1959年时的毕业合影后排（右起第6为朱世能）



1962年7月在校门的留影



参加“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第二排左一朱世能）



朱世能为“和汉堂”题字



朱世能主编、参编的部分著作



1987年5月广州，参加上医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发言并与上医广东校友合影



2015年春节前校友会领导慰问朱世能教授夫妇

得知老会长朱世能病逝的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要不是程刚副会长说老会长走的时候他们都在 IBU 外面守候，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记得 2 月 4 日上午，彭裕文会长，程刚副会长一行代表上医校友会到老会长家慰问，一开门老会长和师母石老师出来迎接，老会长看到彭会长，程副会长高兴的双手作揖，说：“谢谢，新年好！”石师母夸鲜花真漂亮。交谈中老会长说最近身体不错，每天早上都要读报，说到这程副会长还劝老会长有空写点东西，老会长笑着拍拍自己的肚子“肚皮空了，唔好写！”老会长就是这么个风趣，儒雅的学者。

老会长朱世能一生正直、爱国、爱校是上医杰出典范，如今驾鹤西去，我们永远还念他。

一个中国学长心目中的美国人

朱世能

1980 年 2 月 10 日，我们一群充满兴奋求知和疑云莫测心情的中青年学者在北京搭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祖国，途径卡拉奇、巴黎直飞美国纽约。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政府高等教育部派出的第二批出国访问学长，总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教师、研究员 43 名。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过去，两年赴西藏医疗队的生活还历历在目，真是思多绪少，百感交集。

回想出国前几个月的生活，可称丰富多彩：笔试、口试、专业准备、语言准备、美国大使馆面试……长期以来，我们这些人习惯于读英文，不谙讲英语，虽然经过英语的培训，但还是半聋半哑。我的笔试成绩还可以，但到口试时惊慌得对主考老师连来两个“Pardon me?”突然“醒来”，发现老师在讲中文：“请把你的准考证拿出来看一看。”一阵羞惭与慌乱，哪还会有好成绩？想起这些，也增加了我初次出国的忧虑。旅途中，我们在卡拉奇停留一小时，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那要等五小时，其中除了好奇地逛逛免税店外，我就在琢磨能否听懂用英

语预报的航班和通知，发现折扣不小，但对各处的英文标示、布告都能领会。这使我安慰不少，我相信自己能够学好。

我和其他三位同事的出国学习属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上海医科大学之间的学者交流项目，其中与我专业较为多口的是病毒肿瘤学，就是研究病毒与癌的关系。这在当时是个热门，导师是著名的 M. Essex 教授，一位和蔼的地道美国人。听从中国老师的意见和美国老师的安排，我除动手实验外，将两年的学习重点放在科学思维的学习和技术信息的汲取上，为此我尽量听课、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向实验室的众多朋友请教。学习结束前，哈佛大学让我去 7 个城市的学术机构做短期交流访问。在与美国学者、学生，乃至普通美国人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了美国，熟悉了美国人，形成了一个磨灭不了的印象：一个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美国人。

友好美国人

总的来说，美国人表现得很大度、宽容，给人以友好的感觉。他们总是友善客气地听完你的意见和问题，给你一个恰当的答复。作为访问学者，我们被视为两校学术交流的使者，从机场迎接，到院长接见、校刊记者采访，一系列活动都让人感到亲切：从学习安排到生活照顾也处处体现细微周到。校刊发表我们来到哈佛的新闻后，从多的美国朋友自发地问寒问暖，表示愿为我们做点什么。两年中，在学习之余我不但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运动会、还有机会应邀参加美国朋友的婚礼、丧礼等。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五晚上从不间断地义务召集我们 4 人练习口语，到后来交谈的内容海阔天空，包罗万象，使我们不但学习语言，更增长了许多知识。一位原籍希腊的美国教授，姓氏很长，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 D 教授，每隔一月，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他单身，总特地请来说标准话的美国朋友考我英语。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想不想去听他主持的课，我说当然愿意，他又问我能不能为这个课程讲上一二节，当听到我说：May I try? 是他高兴地笑了，表示有我选题，他帮我备课，还说：“这就对了。因为不然单听课要自己付 200 美金，这样我说你即是老师，又是学生，打个报告，听课费就全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帮我认真准备材料，让我试讲，完成了这堂名叫“中国与美国病理学教学的异同”的特殊讲课，赢得了学生的兴趣。

都讲美国人工作像工作，休息像休息。在休息天，我们会受邀参加他们集体的或家庭的活动。在言谈中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留在他们头脑中的是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加上“文化大革命”那惊恐的印象。对这些，我们谈得很坦率。他们常常问：“你来美国有没有 Cultural Shock?”对 Cultural Shock 的含义开始我不完全了解，交谈后，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国不是不好，美国也不是都好。他们笑了。

美国人之间的友好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彼此信任和坦率性格分不开。他们通常说话算数，鄙视欺骗，并且有话直说，有帐明算。一起出去吃饭总是讲明每人分担（上海人叫“劈硬柴”）还是由谁请客。如果属于前者，便会有人在饭桌上拿出计算器，算出每人该付多少。那时代中国人对此不可思议，谓之“小器”，我倒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名言“亲兄弟明算账”的具体体现，使彼此有一种愉快的气氛，增进了友谊。

在与美国人交往中会发现，他们总尽量不使你为难，照中国人的说法，“总给你面子”。一旦你显得很固执，他们不会与你争执。我们有的同胞误会了这点，会在某些场合讲自己国家的不是，这时会有美国人插进这么一句警言：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妈妈是最没有教养的。

美国的警察都经严格挑选，外表上显得端庄英俊，制服和领带都在浅蓝色到深蓝色的范围，值班时全神贯注，向他们问路或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都非常尽职，耐心作答。我难以忘怀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在亨廷登大街快到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后门的一个道口，我经常在早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借导盲犬引带穿过马路，就在那时，警察会立即从值勤岗奔跑过来，一起搀扶老人过街。每见到这种动人的场面，我总感叹地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人间

哪！”

美国人很重情。在我离开哈佛回国之前，举行了一些欢送活动不说，我导师的一位秘书 Sherry 小姐专门送我一条她在空闲时间手工编织的绒毯，并且说：“记得我们的友谊！”我真的很感动，至今我每用它就会想起在美国的日子和美国的朋友。

勤奋的美国人

人当然有勤有懒，总体来说，美国人十分勤奋。看到美国经济的兴旺发达，看到那么多的科技发展，看到文化教育实力，人们不会相信那儿会有许多懒汉。

美国人的勤奋首先与他们在社会中的竞争有关。“不做没饭吃！”“人往高处走！”哈佛大学当时有 11 个学院，每年的考生无数，一些热门的专业（医学、法律、商务）可能要在十几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一名。同样，每年应聘哈佛的教授、教师人数也相当可观。在高校医学院中，哈佛、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分校，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始终名列前茅，当然，群芳争艳，当时初露头角的杜克大学等也颇受人关注。在这些学校中，相比起来职工待遇不高，但着实被看作是“金摇篮”，因为名牌大学的一段经历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将来的供职和赚钱。在两年中，我亲眼见到两位竞争中的失败者。有一门我选择听课的讲座，由各系教授轮流上课，有一次一位教授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情绪不佳，慌慌乱乱，让人感到学不到东西，听课的 100 多名学生纷纷举手提问，秩序顿时混乱，有人请来了主持该课程的教授，当场将讲课教授“请”下台去。此后，我再没见到这位教授的行踪。另一次是一位副教授与担任主任的我的导师因工作等原因发生纠纷，在他们一次细声密谈后没有几天，副教授向几位熟悉的同事道别，客客气气地离任，随即由搬运公司将以他们的科研经费添置的两个大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如数横穿美国大陆迁往新户。后来听说那位副教授任新职后干得不错，不但晋级，还取得了结果。这一点在美国甚为突出，多数美国人将解职、调动等不视为打击或奚落，他们认为，即要在新岗位上做得更好，以此证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给对方和周围人群一个回答。

美国老板很关注勤奋工作的部下。在美国各地，我们这些中国去的学者都愿意多学多干一点，美国老师对我们也都比较信任和赏识。由于实验室的几台超速离心机平日使用十分频繁，我就常常选休息日区完成实验。有一个星期天，我我在操作时因平衡失当，将一台新机器损坏。当时我很着急，不知有什么赔偿的规则，更担心赔巨款。第二天一早，我将情况如实报告了导师的助手，也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很快检查一遍，安慰我说：“没关系，我打电话让厂方派人来换根轴。”还说，“你这么用功，周日也来实验室，要注意休息。”我焦急地问他修理费用贵不贵。她轻松地说，“几百美元的事，你别管了，要知道老板看到大家勤奋工作是会高兴的，多做总会有错，下次小心，别伤了自己。”我当时感动得除了“谢谢”之外，什么话都讲不出。后来我将这事直接告诉导师，他笑笑，说：“助理已将这事告诉了我，你不要在乎这些，不要太累了。”过后我回想起这一切，感到这件事对我的教育是：要更勤奋，也要更小心。

美国人的勤奋在学生身上体现很多。一般每门课程多由好几位教授担任，主持该课程的教授在开始时介绍课程安排，并布置必读的几本主要参考书，学生听课都认真记笔记，并不时提问。他们从来不问考试范围，也不要求划“重点”，凡讲的都要考，参考书上有的也要考。都说名牌大学学生念书有拼命的感觉，我耳闻目睹，坚信不疑。

潇洒的美国人

美国人有潇洒的美誉不无道理。他们平时很随便，吃饭、穿衣，乃至室内摆设都不讲究。快餐、便饭是常事，即便在家举行 Party，也只是些奶酪、蔬菜、烤肉、蛋糕之类。请朋友到家，很好的菜也属便捷之举，是一块烤牛排、一份水煮的速冻青豆，加些啤酒、饮料、水果。烤牛排之前总会有人问客人：“生些？中等？还是熟些？”

即使是“熟些 (well done)”，也必然见血见生肉。除那些十分正规的场合外，美国人请客的高标准是在院子里安排烧烤 (barbecue)，饱食畅饮，有说有笑。说起酒类，美国人多喝葡萄酒、啤酒，再是加冰块的威士忌，一般不喝烈性酒。餐饮之后，很快收拾，清理一次性食具，将碗匙放入洗碗机清洗，所剩食品不会很多，一般都倒掉或进入粉碎机，几声轰响，骨肉成末，流入下水道，一冲了之。他们少有将吃剩食品藏进冰箱的习惯。

美国人穿着很随意，多数人夏天穿衬衣、T 恤，冬天毛衣外披滑雪纺，西装、礼服只是在庆典、重要宴请时露面。在波士顿，就有不少名人，甚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穿着随便地在街上漫步。与此相反，在大学里西装革履、提着手箱穿梭来往的多数是推销员。美国人平时很少谈论穿好穿坏。有一次我穿一件浅蓝色羊毛衣去实验室，一个刚来不久的技术员小伙子高兴地叫起来：“你真像我爸爸！”在中国哪有这种话？细问后知道他爸爸比较年轻，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件衣服对我来说实在是合适。

美国人重视个性化和独立生活。在美国，左撇子（以左手写字操作者为主）较多，约占总人口的 10%，接近自然发生率，原因是美国人从来就顺从孩子自我发展，不强求纠正。事实上，这是比较符合健康要求的。此外，美国小孩从小自睡一床甚至一屋，一到 16 岁就开始独立生活，打工赚钱。有一次我们在炎热的海边见到好几位年轻的妈妈，放她们的 2、3 岁的孩子赤脚在烫热的鹅卵石上蹒跚学步，在旁的中国人看了都揪心。

美国人待人接物都挺简单化，英国式的“*How do you do*”、“*How are you*”都代之以“*Nice to meet you*”。正宗的“*Good morning*”都被“*Morning*”或“*Hi*”代替。“*Good bye*”听不大到，都称“*Bye*”或“*See you*”。我想也许这样做既简单，又随便。早上上班时电梯内外一片“*Hi*”声，真是晨曲一首，绝对不用记姓提名。谈起姓名，不单是美国，西欧国家在一般场合也都呼名不称姓，还叫小名，颇感亲密。但也由此带来一些令人费解的事，3 岁小孩都开始叫“*Bob*”、“*Mary*”来替代对爸爸、妈妈的称呼，在中国人看来真是岂有此理。

给美国人送礼是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实在不缺什么。政府官员最高的礼品标准是 50 美元，多了要上缴。民间交往当然重要，但也不必多破费，而最好的礼物是想得周到的小物件，比如有的朋友平时流露喜欢某样小摆设，你在他生日时送他一个，真是极大聪明。

美国人的潇洒往往与他们的自信联系在一起。美国人除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太短作为憾事外，在很多方面都引以为荣。传统习惯给了他们条件。都知道给美国朋友去信的信封怎么写，真可城简单：从小到大，从己到国。个人的姓名总在前，而且是名在前、姓在后，然后是部门、单位，再是市、州、国家。当然，这些都不能说明美国人不爱集体不爱国，恰恰相反，一旦升旗美国国旗或奏美国国歌，美国人都会表现得尊重、自信，有的启口轻唱，有的还用手掌扞在心前，看了很让人感动。

美国人的潇洒也常同幽默联系在一起。一般的美国人在人群中行动之前总会来一句“*Excuse me*”。有的美国人怕自己的坐站引起不欢，常常来一句“*Am I on your way (我挡了你吗)？*”并一耸肩膀或来个笑脸，马上避让。这样双方会显得很友善。美国人对别人的过错也总给面子，且惯用一种幽默来达到目的。有一次，我们受邀参加宴请，那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正式家庭宴会。不等主人引导，我们的一位同事已缓缓在一张长方桌的一端坐下，主人过来见到这种尴尬场面，立即笑着说：“这把椅子有问题，坐得不好会摔跤，只有我会小心地对付它。”我们的同事不好意思地起来换位置。事实上，正式宴请有个规矩，即男女主人对坐长桌两端，宾客的座位位于桌子的两边。前面我曾介绍美国警察的友善，这里再介绍一个来自一位同事那里有关警察的故事。美国人不主张，甚至不允许在厨房内开油锅，这些都是在租房时特别关照，且大多数房间的顶壁都装有油烟报警器。一次我的一位老师做油炸鱼肉欢宴众宾，报警器起了作用，不久警察来到，走走嗅嗅，随后是肩膀一耸，说：“好哇，下次再起油锅告诉我一声，让我一起来尝尝。”说完一笑，做个手势离场。这事后来传为佳话，听到的留学生都引以为戒，并感到这倒不失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范例。

美国人独特的思维方法增加了他们的潇洒。记得 1981 年 3 月的一天，我正在纽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突然台

上宣布里根总统遇刺。我们立即回到楼上的房间内打开电视机，听到新闻中宣布：凶手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不少人一笑了之。事后，美国朋友告诉我：“听见了吗？我们的总统是受到人们拥护的，谁会去杀他？那是精神病人干的！”据说类似情况也有以相同方式处理的，真令人叫绝。

差劲的美国人

和全国各地情况一样，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也是好人占多数，但对有些人，用客气的话来说，叫“差劲”。只要到过纽约的地铁站，你就会发现那儿经常有人随地小便，臭味恶熏。

美国的地铁车厢内，皮革坐垫（现在已改为硬塑料）被切划，墙上到处涂鸦，不堪入目，据说都用的是油性彩笔，很难擦去。这与每天上下班车厢内挤满的上班族平日里所表现出的安静、文雅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介绍那些都是无聊的年轻人干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怎么不管？那些管理部门的头儿在干什么？

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大城市里汽车处处，少数自行车只能在人行道上骑骑推推。但即使这样，也还有人将之作为锻炼身体的工具。可笑的是，自行车比汽车更容易失窃。于是有的车主在停靠时除了上锁外，还会将前轮卸下，与后轮一起圈锁，真是何雅之有？

美国人的贫富和种族差异甚为明显，一些城市的近郊多有“白人区”、“黑人区”之分。即使在“白人区”，安全保卫也不全一致。有一次，一位中国大陆去的访问学者在家门不远处遇到袭劫，手提小电器被抢不算，头皮也被利器切开。报案后警察赶到现场，一脸无奈，说：“对不起，这里是非警察管辖范围。”真令人费解。结果受伤者在医院缝了13针，自认晦气。后来大使馆通知各地中国学者，要注意安全，不能为节省房租而寄住在非安全地带。

美国城市的安排布局和维护保养总体来说可称“OK”，但有些地方实难恭维。不说纽约北端的残楼破房，如果你见到一些城市市郊结合部的垃圾场，你绝对不会将之与印象中的美国文明联系起来。美国朋友很有趣，会主动讲点丑事，甚至带你去现场目睹。有一次，我被朋友开车专程送去波士顿市郊看“洋相”，那是一片废墟，除堆有大量废旧轮胎外，垃圾成山，附近是一座制造酸菜的工厂，地上一大片酸臭的脏水，令人作呕。我真奇怪，有没有人在那儿主管卫生？

美国一些高级住宅区可以门窗不锁。我们去一位老师家，发现前门不通，就绕到后门从厨房直进客厅和卧室，听说这种住宅内的电器、摆设都不会发生顺手牵羊的事，主人告诉我们：财产都保险，值钱的饰品等在银行保险箱，梁上君子不值得“到此一游”。也有人告诉我，美国的贼偷大不偷小，言下之意，胆敢抢银行，不屑光顾市场。但也不尽然。我在波士顿的商店亲眼目睹白天抢劫。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中国人一起逛街想选个手表，进入一家约有10名店员的珠宝钟表店后，站在钟表柜前看货，突然背后店员尖叫起来，我转身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夺门而出，两名店员紧追不放。几分钟后警察赶到，有几名警察直奔加入马路对面的缉拿队。据了解，偷盗者在珠宝柜台前佯装选货，取走一件饰品拔脚外逃。店主自信地说，警察一定会抓住这个窃贼的。

美国大商店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是相当不错的，任意选货，允许换货或退货。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买主捧着两大纸包的货物走向自己的汽车，一不小心一大瓶牛奶被打翻在地，站在门口的服务员立即赶来，帮助清扫，后面一位服务员提了同样的一瓶牛奶送给他。这家超市从此成为我们购物的首选。与此迥异，一些中小商店就各有不同了。一次在纽约第五街，我踏进一家门口玻璃橱窗内堆满照相器材的商店，两个小伙子问我要什么，我说看看，他们跟着我，一定要我讲出想购什么，我回答说要个合适的三脚架，立即有三四个人拥到我身边，摆开架势，进行各种宣传，最后简直是野蛮推销，还说：“你们日本人有钱，爽气些！”我当然不会暴露身份，更不会说中国人没钱，最后拗不过他们，拿出支票簿，被要求除签出商品价格加上规定的8%的税外，还有什么听不懂的费，反正总价明显超过其他店同类商品的价格。真是哑巴吃黄连，但能逃脱这个“恶魔环境”也算

松了口气，只是上了一课，再也不敢领教了。

以上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人是怎样的”的一份答卷。在这里我尽量多一点记叙，少一些分析。怎样看待一个国家的人民确非易事，这不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在我心目中，美国人既有友好、勤奋、潇洒的优点，也有差劲的一面。我们要去熟悉他们、理解他们、交往他们，就像他们要熟悉、理解、交往我们一样。

重要更正



为了纪念颜福庆先生的卓越功绩，弘扬他倡导的“正谊明道”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凝聚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推动上海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复旦大学特别成立了“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隶属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所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上海医学院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

国内捐赠（具有中国大陆地区免税资质，同时接受无免税需要的各类外币捐赠）

电汇或银行转账

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

帐号：4572 5923 3986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国定路支行

银行号（SWIFT CODE）：BKCHCNBJ300

支票、邮局汇款及现金、刷卡捐赠

抬头：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1号楼121室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664305 021-55664930

传真：021-65648138

2014年第9期总第28期《上医校友会简报》登载了枫林校区建设项目“添砖加瓦行动”捐赠介绍，其中第10页“国内捐赠电汇或银行转账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有误（如上图），应更改为“国内捐赠电汇或银行转账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而“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字样，请在汇款或转账单的“用途”栏目里填写。给您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上医校友会